

现代社会生活的批判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当代建构

宁 琳^{*}

〔摘 要〕 寻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流动、优才统治、科层组织的影响以及对现代人生活及其观念的改变,可以发现,当代西方“才华和无用的幽灵”以及无根基的知识缘由驱逐着“匠人精神”,凸显没有任何个性和生命活性的“数据”,逐渐边缘化了个体的精神理念、审美情趣以及个人偏好,因而生命在“无根”之状中无价值性地存活,这导致了精神与人格分裂成了西方现代人的共同病症。如此,透视现代生活,找寻现代社会的新生活进程与确认新的价值坐标,摆脱所谓人的内在、外在能力的挖掘之取向,锁定“交易”的边界,超越“技能社会”、“技能经济”并进而超越由主义的斯密模式和军事化的韦伯模式,解构现代人生活的“焦虑感”、“恐惧感”与“虚无感”,从被遗弃的生存感重新找回、建构自我的幸福。只有认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病症,才可融入并超越现代社会的历史局限,寻到自我解放的道路。

〔关键词〕 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匠人精神

当代西方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他们的生活被大型社会机构割裂,迷失在工作的各种需求中;他们四处迁徙流动而无法固定下来;他们原有的生存共同体分裂了,无奈地困于陌生的社会和人群中,并不断地自我陌生化。而这样的流动的陌生化的生活时时提醒着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中,所谓“安身立命”的命题乃是一种对前现代生活思维的眷顾,是一种对现代生活流变的文化抗争。如此,流变、无根注定了现代人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发生非固定化、移动不已和变化莫测的变化——这已成为当代西方许多人共同的精神征兆。那么,当代西方人的“生存何以可能”?其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在何处?进一步,其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当代建构有哪些有益启示呢?

一、流变中生活世界的迷茫与失落

现代人共同的精神征兆首先表现为:善变成为现代人的个体性格。在不稳定的、分碎的社会环境中,现代人不断地在时间、才华和放弃之间寻求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基点。他们随着工作任务、工作场所不断地转换自我角色而准备随时自我重构。然而,当人们满怀希望进行自我角色转换和自我重构的时候,社会却不断地在悄然发生变化。虽然人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并希求以此获取工作、立足社

^{*} 文学博士,东北农业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讲师,150030。

会,但是人们发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努力却无法赶上社会的变化,因而许多人感觉到自己一再被社会的变迁所戏弄。

在现代的经济体系中,人工重新培训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匠人精神,即将某种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在优才统治的文化背景下渐行渐弱,甚至被视为是前现代生产的遗存。那源于手工劳动者,如制作小提琴、手表或者陶罐时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曾不仅仅存在于体力劳动者那里,在脑力劳动者那里也同样存在着,表现为文人“努力把文章写清楚”,社会生活中人们努力“打造一段白头偕老的婚姻”,制造工艺秉承始终如一的标准和规格。如1761年诞生的德国洛塔尔铅笔,“规定了现今仍使用的铅笔标准规格,例如长度、直径、铅硬度等级”。^①匠人精神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注重标准使生产者将自我的精神理念、审美情趣、个人偏好以及技艺上追求完美与卓越的个性化特质熔铸在对象之中,也就是“他把精神关注在那件物品之上,全然忘了自身的感受,并通过是否把事情做好来评判他自己”,专注、精益求精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但这种专注的态度在现代社会经济体系中却遭遇尴尬,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不鼓励匠人精神的发扬。“匠人精神”那种“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却发现:“资本主义的柔性机构是容不下匠人精神的”^②。事实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假如遵循“匠人精神”来生产,只有待产品达到至臻完美才出售,势必会导致消费者对产品需要的终极。那种“尽善尽美”的诉求成为现代商品生产和商品运行中“自杀”的方式。残缺、不完美才有需求的不断更新,从而为现代经济提供活力,“升级”、“更新换代”成为现代日常生活的常态。同时,在“匠人精神”指导下的“生产”不仅在生产制度上具有世袭性、生产出来的产品上具有个体差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与生产者之间具有独特的匹配性。渗透着“匠人精神”的生产,生产者掌握和拥有一门特殊的知识或某种绝技,换句话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技能。而与“匠人精神”有别的现代社会,提倡的是“优才的统治”、依赖的是“优才统治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估才华”,它关注的是一种特殊的才能,也就是潜力。用职场的话来说,一个人的‘潜力’要看他或她处理不同问题,学习不同学科的能力”^③这样人的能力似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与拓展,人的“内在能力”和“外在能力”得到充分的挖掘。如此,“更让人费解的能力是情商——情商高的人圆滑、处事得体,能够听得出别人的话外之音,这是一种给人们在生活中的实践造成深刻影响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不断得到开发,每一个人都按照“人精”的目标塑型自我,面对着各种“考试”、“考验”,“无论是考官还是考生,都假定它们(某一个语词)有客观的指示对象”^④。经过各种的标准化考察,人的能力得到了一种可量化的指标,从而成为一个丧失了个性的数据。最后“人类精神生活才去了一种肤浅而狭窄的形式。社会的参展、感官的推理、情感的理解都被排除在这次追寻之外,信仰和真理也概莫能外。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人员流动频繁的机构中,对才华的追寻确实是在社会融合的框架中进行的”^⑤这一特征的肯定,将“优才统治的制度”中的一种新的精神生活特质揭示了出来:“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从一个团队转移到另一个团队”。“作为团队成员,他们自身能够胜任变动的工作,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在组织里换岗。这样的劳动确实需要一种才华,也就是撇开背景和参展,预先思考应该做些什么的能力——往好处说,这是一种在想象中工作的能力”^⑥。事实上,这正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一个叫作变动不居的、充满着吊诡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的变动不居需要人们具备更为灵活、更为优异的品质去适应。这样,现代社会治理的理念就越来越青睐于优才统治。优才统治的理念注重挖掘人潜在的能力,而不太关注一个人过去的成绩。过去的成绩并不足以让人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一理念迫使着人们努力培养一种看轻自己已经拥有的经

①李慧亲、谢统胜:《德意志制造》,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101页。

②③④⑤⑥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8、86、91、84、92页。

验的性格特征,而“拥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像贪心的消费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抛弃那些虽然功能完好但已显陈旧的商品,他或她不会敝帚自珍地守护已经拥有的东西”^①。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工作,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而这种看轻自己已拥有的经验的性格特征以及勇于面对自己生命的新出发点的工作方式,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们不得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心理模式。这便是“多重的自我”被社会肢解后难以黏合的活法了,难怪精神与人格分裂成了西方现代人的共同病症。尽管大多数人依然需要持续的生活叙事,以拥有某项专长为荣,珍惜有过的经历。然而,在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旗帜下建构出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文明,它追逐流动的自由,社会机构、技能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变革。那些只顾眼前、开发潜能、从不后悔的新男人或女人成为社会成功人士,却并没有感受到成功带来的幸福。如此,拥有与失去、延续与断裂、灵与肉的区分已经显得毫无意义。一切诱惑都充满着成本的考量、一切风景都成为鲍德里亚的“Cool remember”或“Cold memory”,现代社会对“人”展开欢迎的双臂,却隐性地伤害着每一个人,我们连呻吟的必要都丧失了!如此,人们不禁要追问:现代生活到底应该要具备怎样的生活思维呢?或者真正生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

二、现代西方社会的新生活进程与坐标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它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变化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那种生活节奏是马克思从未真正亲身体验过的。然而,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现代社会正在经历的真实生活状况却是:在资本求利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整个社会像注入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财富的生产与利润的追逐成为这个社会的轴心——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在资本面前统统化约为金钱与商品的交换关系,体现为现代生产制度、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所具有的效率与合法性。而实际上,这种商业规则向生活世界各个领域渗透与扩张的效率原则和工具理性精神,使得社会价值原则悄然发生变化——已无可挽回地滑向了以“交易”取代“交情”的物质主义泥潭。

为了效率,“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军队的运作方式、让企业中的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职位,并且让每个职位都有清晰的职能”^②,这就是韦伯的军事化生产组织模式。韦伯的将军事化思维向社会渗透的军事化模式通过建立科层制的组织形式,把军事模式推广到商业机构和各种市民社会的组织中去,这导致了社会中各种有关友爱、权威和情景的规范同样具备军事的性质,而与此同时,这也使得人们的时间观念、生活观念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时间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则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生活叙事方式的变化。在科层制中,人们对于“职位”的升降尤为介意,然而“职位的阶梯是件虚幻的物体,组织着个人对其自身的理解;人们要么向上爬,要么朝下降,要么维持原位,但总有一根可以踏脚的横档”^③。因此,“科层组织让人们学会了延迟满足。你不会去判断当前的行动对你有什么影响,而是学会了思考如果你现在服从命令将来会得到什么回报”,^④如此,人们对于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现代人只有“精英化”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状况,才能具备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也才能具有现代生活的生存资格。科学家“通过研究的变迁,达到也许是有创造力的和多方面的引导”。^⑤社会科学家也同样具有如此的雄心,他们研究文明的进程寄希望于:“将来有一天等人们对这些进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许就能有意识地对它们加以引导”。^⑥其实,现代社会是一个抛弃“人”的社会,是人本身被彻底工具化的社会。这样,桑内特用“无用的幽灵”这一语词来描述现代社会人整

①②③④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第3、6、9、15页。

⑤保罗·费耶阿本德:《无根基的知识》,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⑥诺贝特·艾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56页。

体命运被温情脉脉的说教与修补策略之“无用”与荒诞之幻想和困境。桑内特这样分析到：“导致无用的幽灵威胁到当代社会的因素有三种：全球的劳动力供应、自动化，以及老龄化的管理”^①。他在分析“无用的幽灵”产生的社会机制时，首先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也追求廉价的才华”入手，提出市场“恶性竞争”带来一系列最可怕的现象：“从事那些非常刻板的劳动的往往是拥有很高技能的机械师”；“许多南方国家的儿童离开家庭和学校，去血汗工厂打工”；“许多呼叫中心个人受过两年以上的大学教育，此外，他们还得到良好的上岗培训”；“印度的呼叫中心还强调‘拓展学习’”；“那些呼叫中心还给它们的工人上‘人力资源技能’培训课”；“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很有能力，而他们得到的薪酬确实非常糟糕”^②。此外，桑内特还在资本逻辑利益最大化的固有本性之外，用分析“无用的幽灵”时引入了文化因素，他是这样分析的：“某种文化选择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工作岗位才会离开美国和德国，转移向各个低工资的经济体，那些地方的工人有足够的技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有时候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③。其实，“人才”、“人力资源”市场的“恶性竞争”，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争斗生存机会的斗争的无序化。通过文化修饰和掩饰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厮杀更具有计划性和规模化，从经济领域、利益分割战场直接成型，渐渐地扩展、蔓延到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包括现代大学争夺所谓人才的竞争。然而，为了累积财富和满足占有财富的欲望，现代社会不断地进行自我技术革命和置换运行的装置。这样，桑内特将产生“无用的幽灵”源头导向了对资本运行中不动资本、资本的技术构成的变化。于是，桑内特分析道：“第二个无用的幽灵潜伏在自动化之中。害怕机器将会取代人类的心态由来已久。第一批蒸汽纺织机的出现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纺织工人的暴乱；到了19世纪末，许多钢铁工人痛苦地发现他们的技能将会被剥夺；由于复杂劳动被机器抢走，他们只剩下那些低工资、枯燥单调的活可以做。然而，在过去，自动化的威胁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严重。”^④因此，桑内特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机器本身的设计和发展上，因为在过去“这些机器只能用于机械性的服务。现在，我们拥有的机器却能够削减各种各样的劳动”，而“现代工人终于遇到了自动化生产带来的无用的幽灵”^⑤，而且这些“无用的幽灵”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他们在满街游荡着、“觅食”着。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是一架没有亲切感、人情味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的机器系统。在这一系统中，人们无时无刻生活在人被物遮蔽、人被物化、人被机械化的矛盾、痛苦、纠结和撕裂情感世界中。这样，心灵与精神的世界被生活搁置了。那么，在这样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呢？

三、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当代建构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不断成熟，但是中国当今社会权力本位尚未完全退出市场，权利与资本相勾结，强势又无限地扩张与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人们的生存空间却在受到重重挤压。因此，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其前进的步伐显得如此步履蹒跚，其一方面表现为市场经济慢慢溢出它固有的边界，向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扩展，并且在肆意僭越社会的游戏规则；其另一方面表现为陈旧的各种因素与势力以“传统”的名誉被无条件地合法化并构成了当代生活中最为畸形的景观。而这病态的社会景观却在操纵着人们的价值理念、生活情趣与生命的意义；人们置身于其中，深感无可奈何，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承受着。由此，这造成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的贫困与创造智慧的贫瘠，其中最为显著而滑稽的是遵循着文化保守主义思维的“复古”思潮。这一思潮，无限推崇传统思想，一味地高估“古代智慧”，不遗余力地抨击“人心不古”的惨淡现实，希望拯救当下人们全面溃败的道德与精神。然而，由于当今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复古思潮植

①②③④⑤ 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第62、62—63、62、65、67页。

根的土壤,所以这一思潮只能退守到教化的平台上,在与以资本逻辑支撑与构筑起的现实生活进行直接碰撞和深度对话时,显得苍白乏力,无计可施,因而他们只有通过自我陶醉与自我超度而“独善其身”。面对于此,我们在思考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类问题时,应该正确找准自己的历史平台与生活坐标,真正确认并确证自己。

为了确认自己不断地追逐技能成为一代人的生存目标。人们试图通过获得教育、掌握特殊技能为自己从这个社会的生存夹缝中撕开一条更大的生存缝隙,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选择空间。于是,他们忙碌于报考各种培训班以求获得“技能证书”。然而,殊不知,在“技能社会”里,技能需要却在随时在变迁,让人无所适从、永远赶不上技能需求的变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手捧一大堆表征自己“无所不能”的“技能证书”在人力资源市场求职却仍然上找不到工作的现象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加入“无用的幽灵”队伍,成为现代社会的失业新军。为此,桑内特用“才华和无用的幽灵”来揭示在现代“技能社会”中,人生活的艰难、艰辛以及现代社会自身的运行困境。桑内特面对欧洲的历史进程之事实,解读出与我们的生活相似的情景:“教育机构开始以维多利亚人无法想象的幅度提高算术和语文的标准。有才华的贫苦少年渴望成为医生或者律师的大萧条时代梦想在今天看来无非是稀松平常的理想而已”^①。因而,桑内特指出,“无用的幽灵最初是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出现的;那些来到城市的农民脚下再也没有可以耕作的天地。大量的农民破产之后来到城市,希望那些机械化的工厂能为他们提供职位”,事实上,“在工业时代早期,很少劳动者能够得到更高的教育;能够向上流动的更是微乎其微”。^②这样,他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随着城市的膨胀,无用被当作是发展的必然后果,尽管是可悲的后果”^③。因此,教育成为拯救自我、塑造自我、开展自我于社会的必要手段与程序,大众在教育启蒙的引导下,获得对社会的认知之同时,获得社会所需要的技能。然而,当父辈无知识、无技能而备受社会拒斥的命运并未彻底得到有效果的改变时,在纷纷已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各种现代所谓新技能的“我们”,却在一夜之间也变成了与父辈同样的“无用的幽灵”。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来临,“老龄化划定了更为广阔的无用的领地”^④。在现代经济中,因为“技能的有效期”与年龄之间的反比关系,社会出现了一个不可改变的“老龄化歧视”悖论:“在20世纪50年代,把退休年龄设定为55岁或者60岁时合情合理的,因为当年普通工人的语气的寿命只有70来岁。现在,50%的美国人能够活到80岁出头,而且大多数人在70来岁的时候还很健康。如果退休年龄依然按照原来的标准,那么本来还有能力工作15到20年的男性,在这段时间里只能无所事事。与其说工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继续工作,倒不如说工作已经将他们抛弃”^⑤,于是大量的“无用的幽灵”被制度化地生产出来。为了不被社会淘汰,人们似乎需要不断地进行技能学习,因为“劳力市场经济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出现了”^⑥“雇主可以重新培训一名50岁的员工来让他们与时俱进,也可以雇佣一个跟得上时代的25岁的聪明人。雇佣聪明的年轻人划算得多,因为年龄较大的员工薪酬基数较高,而且对在职员工进行重新培训本身需要花很多的钱”^⑦。这样,如潮般涌入社会、具有各种优势的“年轻人”,成为“新人”不断替代“老人”,新老更替成加速度发展。因此,这种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无用的幽灵”,被置于现代经济中,不仅仅是对“无用者”自身的生活带来一系列困境和麻烦,而且对整个社会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结语

如果想在现代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能自如地展现自我的存在可能,并实际地生存下来,就必须将

①②③④⑤⑥⑦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第61、60、61、68、69、70、70页。

“自我”的内在本质性的“潜力”变成一个不断叠加的复数,否则,任何人都面临着必然遭遇被社会抛弃的可能。现代社会对所谓“特异才华”的技术变得精湛“、并通过对才华的寻找当代“消灭和提拔个体”。^①然而,“无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在能力,他的技术的提高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需要反复的锤炼”^②。如此,一个无限完备的自我、即一个“理想的自我”所应该具有的适应社会需要的规定与品质,构成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焦虑感”与“恐惧感”的来源。因为“你”与“我”一样,是一个个体的“人”,其“潜力”无论如何总是有限的,这就命定了我必然会被不断要求“潜力”完备和“潜力”多样性的社会无声地抛弃,至少渐渐被“边缘”,这是“我的”宿命。“我”因为“潜力”的天然而客观地限制,“我的(生存)权力”被“剥夺”迟早都会来临,也必将成为“事实”。因为“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展示我还能够做些什么?我待开发的潜力已经殆尽,我最终蜕变为彻底“无用的幽灵”“他们被断定为再也没有用,或者再也没有价值,不管他们原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就这样,“我”最终被当作“缺乏内在资源的人”,被社会、被生活无情地“遗弃”了,而不断增加的“客观存在的无用的幽灵拉开了一出忧虑的文化戏剧的帷幕”^③。西方人就这样摆脱一个“宿命”,又陷入另一个“宿命”,自由与解放之路何在?由此,我们有理由立足自身文化背景,不卑不亢,对已然感受到的文化参照标保持一种批判的视野,在选择与建构中,清醒、明白地走向现代社会,并以较小的代价,走过蜿蜒在我们面前、无人走过的路。

(责任编辑:杨嵘均)

A Critique of Modern Social Life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NING Lin

Abstract: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mobility, the ruling of the elite and hierarchical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is plagued by the following problems: “the talent and specter of uselessness” and baseless knowledge help form the so-called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ll has been turned into the mundane and lifeless data; and any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preferences in spiritual life and aesthetic taste has been marginalized. Therefore, it can be said that people are living a vacuous life lacking values and a solid foundation. This leads to the epidemic of the split between people’s spirit and personality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Facing these problems, the “theory of a new page” was advanced for us to fulfill the following purposes: through examining the modern life, to chart the course of the new life in modern society and establish a new position in the value system for modern life; to get rid of the orientation for exploring peopl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bilities; to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various forms of exchanges and rise above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y” and then above the liberal Smithian model and the military Weberian model. In so doing, the anxiety, fear and nihilism troubling modern people can be deconstructed, the once-deserted belief in life and existence restored and a new sense of happiness constructed. Only when the cause for the symptoms of the new capitalist culture is recognized and analyzed critically, can we understand and overcome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modern society and find a path to self-emancipation.

Key words: capitalism; modern society; social order;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①②③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文化》,第99、97、98页。